

游走在“民间”与“半职业”的非遗舞蹈传承人研究

——以松桃苗族花鼓舞为研究个案

蒲志怀

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传承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以贵州省省级“非遗”名录(传统舞蹈类)松桃苗族花鼓舞传承人龙云辉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民间艺人身份建构下的松桃苗族花鼓舞实践活动、传承人“半职业”身份建构下的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来研究其身份变化下对松桃苗族花鼓舞传承发展起到的不同影响,总结出“非遗”舞蹈传承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使其仍然是非遗传承发展的核心所在;在非遗的传承中我们可以充分鼓励、利用传承人“身份的变换”实现“非遗”的传承发展。

【关键词】传承人; 身份建构; 花鼓舞

【项目基金】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贵州松桃苗族花鼓舞研究”(项目编号: 16 jsxm036)研究成果。

“非遗”传承人在非遗工作的发展中越来越被重视和关注。从文化部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的内容可以看出,对国家级传承人的认定从技艺精湛程度、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传承活动开展、品质修养等方面都做出了细化规定;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还增加了材料复核、现场答辩、公众异议等评审程序。可以说当下社会对传承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传承人“自我完善”势必反作用于非遗舞蹈,这对非遗舞蹈发展的影响是回避不了的。

松桃花鼓舞的传承人龙云辉是当地民间选出的“鼓王”,多年来深耕苗族非遗舞蹈的发展与传承,在花鼓舞的实践和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为传承和保护非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四面鼓舞的传承人龙云辉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传承人身份建构阐述说明传承人与传承艺术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

1 传承人承载历史文化价值

研究历史文化离不开翻阅典籍和考古实物,而典籍、实物不足以记录全人类文化。民间社会采用的口传身授、口耳相传等方式的“活态传承”却深刻的记录着文化与历史,是我们需要多关注的。“非遗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与地方民众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互动中会不断创新,呈现出活态性和生产生活性^[1]”。

农耕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文化系统。鼓舞作为苗族文化蕴含了苗族社会文化、审美、民俗、信仰等。龙云辉通过家传、拜师、观看、模仿等多种传承谱系成长为鼓王,而龙云辉本人的学鼓、习鼓过程中不仅承袭了苗族传统花鼓舞的拜师仪式,还多次投入到各种场合、接触不同人群、学习实践多种路数的鼓舞,自然而然龙云辉也成为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者。龙云辉家传了制作鼓的手艺,他用脚步丈量了每一处花鼓村寨,向民众学习打鼓,掌握了鼓舞的“路数”,为鼓舞走向舞台、走进学校积累了素材,为自己身份的转变打下了接触。他通过学鼓、赛鼓、切磋、制鼓的行为都体现了传承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

2 民间艺人身份建构下的松桃苗族花鼓舞

“在原有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融进新的文化元素的、继承中的创新成为生产性保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80-90年代苗族以绝技绝艺闻名海内外,借着机遇,龙云辉组建了演出团队在全国巡回“卖艺”,演出内容有绝技绝艺和苗族歌舞,浓郁地民族风情表演满足了人们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也对民族文化传播、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赶场天”用来娱乐的花鼓舞在经济推动下演变成了“商品”产生了经济效益,民间艺人纷纷组团模仿龙云辉的团队在全国进行表演。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统花鼓舞样式逐渐消解,全新的风格逐渐形成。龙云辉家族进行了

大胆的创新;首先,摒弃两面鼓使用四面鼓,这为巡演道具的搬运提供了便利。其次,表演队形丰富化。两面鼓只能容纳两人进行表演,而四面鼓最多可以容纳八人进行表演,这增强了鼓舞的表现力,舞蹈的调度自然也丰富起来。最后,形成的恢弘刚健风格更加具有感染力。以田间地头的娱乐到搬上舞台注定鼓舞要突出表演性。龙云辉将鼓舞动作幅度放大,强调运动路线,从民众“围圈而舞”转为观众坐在台下看表演,于是造就演员打鼓的强大气势,形成了现代花鼓风格。“这种身份的建构动力主要来自民间艺人在生存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自我身份的期待、认可和努力,属于能动性身份建构”。

3 “半职业”身份建构下的实践活动

“半职业”是一个介于职业与业余之间模棱两可的词。传承人龙的鼓舞水平是职业水平,而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进程中龙云辉只能是游走在职业与业余的“半职业”教师。

21世纪初,“非遗”使民间艺人拥有了国家认可的身份——传承人,在身份的光环下多次代表政府参加赛事演出,为宣传苗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官方认可身份在社会建构和民众认同的同时也间接地对艺术本身提出了要求。他是民族文化的代表拥有了教师身份进入学校教书育人,参与到政府主导的文化实践活动。作为党员的他,自进入学校后对民间艺术本身的传承与创新投入精力更多了。“这种身份建构动力只要是来自社会整合与秩序维系的需求,以法律法规和民众惯习而进行权力、责任与义务的定制”。龙云辉在新的社会身份、艺术创作中进行着积极重塑。学校的教学是新的基础和起点,学生是花鼓舞新的接受主体。他态度认真,潜心地教书育人,结合传统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编创了符合青少年能力的苗族花鼓舞作品,带领学生荣获大奖。花鼓舞成为新的资源,传承人也由艺人变成了教师,新身份的建构与新的接受主体认可密不可分,作为媒介艺术在这个进程中一改舞台表演的夸张与绚丽转为古拙朴实。鼓舞艺术在国家主导下的环境中返璞归真,为了方便教学,将动作进行了归纳,使鼓舞风格趋向于规范性、训练性、科学性、简洁性和程式性。

文化资本与社会身份转换的不断适应,注定了传承人多元的身份建构会有目的的选择合适手段使文化资本不断跟随国家主导脚步,完成自身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陈华文.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 87-91.

[2] 李荣启.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途径[J]. 文化学刊, 2012(5): 117-122.

作者简介:蒲志怀, 硕士, 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舞蹈系教师, 讲师, 研究方向: 舞蹈教学及理论研究。